



华夏文摘增刊
文革博物馆通讯（六九二）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八六〇期 ——
(二〇一二年八月二十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1208c)

【劫后反思】	为什么当年北京最出色的女校学生， 会做出如此伤天害理的事情？（下）	雷一宁
【史海钩沉】	恐怖的“红八月”	王友琴
【学术争鸣】	毛泽东的文革与人民的文革 ——大众为什么不愿意全面否定文革	郝 忱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表明 CR 字样。

【劫后反思】

为什么当年北京最出色的女校学生，会做出如此伤天害理的事情？（下）

• 雷一宁 •

第三个问题：关于那篇署名为宋要武的文章《我给毛主席戴上红袖章》

你们众口一词说，此文不是宋彬彬写的，宋彬彬也没有改名为宋要武。以讹传讹，把宋彬彬妖魔化，令宋彬彬非常生气……那就让我先提几个问题吧。

（1）按常规，报社 / 报纸对于所刊载的材料都是必须存档以备后查的，作为党的喉舌、社会良心的编辑 / 知识分子，四十多年来竟然没有一个人 / 一群人站出来说一声“是我 / 我们写的”，而听凭一个对党对毛主席“无限信仰，无限热爱”的女孩承担需要千斤顶才能顶起的责任，这些伟光正的共产党人的良知 / 灵魂都叫狗吃了吗？即使确实不是你们写的，也应当以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向人民大众说清楚啊！

在《想说的话》中宋彬彬说：“8月18日下午返回学校后，《光明日报》一位年轻的男记者来采访我”，既然如此，你应当把他“揪”出来。记者采访总应当有这样的开场白：“我是《光

明日报》记者X X X，你就是宋彬彬 / 宋要武吗？”你见过他，该是知道其姓名的。

（2）既然不是你写的，那些了解你、关心你、地位也够高、“关系”也够广的父母、长辈、亲戚朋友（不包括红卫兵），为什么没有一个人 / 一群人助你一臂之力，向报社、向社会、甚至直接向毛主席去反映，而任凭一个无辜的女孩受冤屈 / 被妖魔化？从1966年的8·18到现在，有几十年的时间够他们 / 她们考虑，让她们 / 他们拿出勇气呢！难道是她们 / 她们根本就没有见过你因此文“非常生气”的脸色，没有听过你对此文斥责的言语——事实是，直到1966年8月底还有个“关系”和你家够密切的人，要“利用‘宋要武’的名声保自己”，而你也答应他了（见《想说的话》中的湖北省委事件）。可见直到此时，仍没有人看到你为“要武”这个名字“非常生气”的脸色。

（3）既然几十年过去了，前两点都没有成为事实，那么，你就必须扪心自问了：真实的情况到底是怎样的？或者，你真的没有写，是写的人的良知 / 灵魂叫狗吃了；或者，是你撒了谎，说了假话，原因是……；第三种可能，在记者访问时，你说了很多（并不是你一再声明的只有那两句话），后来都被执笔者放到文章中去了；还有第四种可能，当时簇拥在你周围的人 / 红卫兵很多，都你一言我一语地、争先恐后地表达了自己的思想感情，后来几乎都被记者放到文章中，放到你的名下了。

1966年8月18日毛接见红卫兵的情况，是向全国实况转播的，此外还有中央台的新闻联播，因此，从毛泽东出现在天安门城楼那一刻起，到晚上8时新闻联播结束止的这段时间内所发生的一切，全国人民立即就听到 / 看到了：“今天早晨五时……毛主席便来到了人群如海，红旗如林的天安门广场，会见了早已从四面八方汇集到这里的革命群众……戴着红袖章的红卫兵，英姿勃勃……在大会进行中，师大女附中一个红卫兵，登上天安门城楼给毛主席戴上了红卫兵的袖章，毛主席和她亲切握手……”这时，在你周围的红卫兵们，哪一个不是兴奋，激动，欢呼雀跃，热泪洒面的呢？当他们争相握你这双毛主席握过的手，表示祝贺时，你和红卫兵们是否有一个表示过 / 说过“不”？没有吧？《光明日报》那位年轻的记者正是在这个时段采访你的，那篇文章正确无误地反映了你 / 你们当时的思想感情，对吗？对自己来个拷问吧。

至于说，后来有红卫兵说“你没有资格给毛主席献袖章。”那只反映了你们红卫兵内部有矛盾的事实，那是另一个问题了。在《另一种陈述》中，你说“8·18下午回到学校后很多人过来跟我握手，还有人开玩笑：‘彬彬，你以后就改名叫要武吧！’我说那是毛主席说的，我不配。”首先，这时间不应只是“回到学校后”，还应当包括“在天安门广场时”；其次，这“不配”，是指不配“要武”这个名字。既然如此，作为一个毛主席最最信任的“革命小将”，为什么当时你不直截了当地对毛主席说“我不配”呢？事后对别人说“我不配”，这不仅是“客套”，一种虚伪的“谦虚”，恐怕还有“此地无银三百两”之嫌了。事实是你以整个事件为傲为荣的。你是写日记的，这便是你当时写的日记：“我给毛主席戴上了红卫兵袖章，主席还给我取了一个有伟大意义的名字……‘要武嘛’”（见北美出版的《世界日报》，《文革卅周年祭》系列中孟蔚彦的《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一文）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对报纸的做法“非常生气”的呢？只能在8月20日看到这篇文章之后。8·18那天，在天安门上，一介武夫的林彪紧跟在毛泽东身后，第一次向全国显示其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以副统帅的身份赞扬红卫兵的“敢闯、敢干、敢革命、敢造反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并向红卫兵布置任务：“要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要扫除一切害人虫，搬掉一切绊脚石！”于是，红卫兵们马上“立竿见影”，一离开天安门广场，就杀向社会“破四旧”，使“红色恐怖”立即达到高潮，延至全国……对此，《人民日报》在8月23日发表了一篇社论《好得很！》。罗嗦这些，是为了说明，8月20日，当你在《光明日报》上看到你的文章《我给毛主席戴上红袖章》时，你已经目击了“‘8·18’后的暴力升级、

打人成风”（见《想说的话》），开始意识到那天在天安门广场上自己的作为所引发的严重后果，再联想到8月5日在师大女附中的作为，你更害怕了。因此，你对《光明日报》还要扩大你的影响“非常生气”了，开始声明文章不是你写的，你的名字也不叫“要武”，来掩饰“正是你写的 / 完全表达了你的思想感情 / 宋要武就是宋彬彬”等不可否认的事实，用谎言掩盖真相！

你的好朋友刘进，在《另一种陈述》说：“如果8·18是我带队上天安门而不是让她去，也许不会发生戴袖章的事，也不会让她在40多年中承受巨大的压力和指责。”这说法，从形式看，不错，因为没有第二个人名字叫“彬彬”；然而，从本质看，错了。由于没有第二个人名字叫“彬彬”，同一种思想感情的表现形式就不一样了。

为什么？我在上文已说得够清楚了，你们的红司令下了决心，要斗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从他下令公布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那天起，他早就选定了“革命师生” / 红卫兵做他的马前卒，之后，红卫兵们的表现也让他很满意。这时，他在给江青的信中指责林彪“为了打鬼，借助钟馗”，其实这正是他自己当时的心态。他在精心筹划，密切观察，等待时机，等待“钟馗”的出现。8月17日，他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以“中央文件”的名义下发到县、团级，并由红卫兵转抄，传遍全国；同一天，《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在游泳中学会游泳》；次日，8月18日，他就登上天安门城楼，接见百万红卫兵（主要是高干子弟、红五类）……这时，你们这些“天下者我们的天下”的当然接班人，你们这些正处于生命危险时期的红卫兵，就像站在十字路口的勇士，急于寻找自己的榜样，寻找自己的领路人。8·18那天，你 / 你们就“像照镜子一样，从别人那里发现了自己”（马克思语），于是，一拍即合，当你们以红袖章公认他是红司令时，他也赋予你 / 你们“革命”的特权。这“一拍即合”是必然的，本质是相同的，不管采取什么形式。这里，提个问题：8·18那天，到底是谁决定刘进和宋彬彬带队到天安门广场的？难道仅仅由于你们是女附中的“领导”的缘故？在广场时，又是谁决定宋彬彬而不是刘进上天安门城楼的？由于刘少奇、邓小平、毛泽东等许多权贵的女儿都是女附中学生缘故，你们是“通天”的，毛对你们的“表现”也是先知先觉的，而你们是在“8月18日的前两天就接到去天安门广场集会的通知”的（见《想说的话》），会不会这一切都是事先安排好的？请拷问你们的灵魂！

8·18毛登上天安门城楼，接见百万红卫兵，把“彬彬”改为“要武”，就轻而易举地达到他的目的，也许是他事先没有料到的。他所领导 / 支持的群众造反运动，还必须调动更多更多的革命小将，于是，他两次，三次，四次……总共8次接见来自全国的、出身和成分都比较复杂的红卫兵，加上“免费坐火车，免费吃饭，免费住宿”的“大串连”，数以千万计的红卫兵就把“要武”的指示撒向神州大地。

那时，我和我的一些同学朋友，在离京城十万八千里的青藏高原的学校里，毫无例外地受到源于京城的“要武”冲击波的冲击。红卫兵们，在天安门前见到了“万岁爷”，迫不及待地回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立竿见影”。不回家向父母说一声“我回来了”，就直奔学校，把睡梦中的老师 / 牛鬼蛇神轰起来，揪出来，勒令他们头戴高帽，颈挂黑牌，一只手拿铁制的烂簸箕破脸盆，一只手拿一根短棍或树枝，嘴里喊着“我是X X X X！（内容因人而异）”，敲敲打打地到大街上示众……这些牛鬼蛇神，有的是班主任，就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的是课讲得好，就成了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有的则是讲课时的偶然口误，或批改作业时的偶然笔误，就成了现行反革命；有的则是背着已经作了结论的历史“黑锅”，就成了历史反革命……与卞仲耘校长的遭遇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不同的是高原的夜晚，寒风刺骨，大街上几乎空无一人……没有被整死，是侥幸，是偶然（不是必然）（详见雷一宁写的《脱胎换骨纪实续》）。

在这“红色恐怖”的冲击波的冲击之下，在一个月里，仅北京市就有三万三千多户人家被抄，一千七百多人死于红卫兵的殴打。全国呢？恐怕不会是数以万计，至少是数以十万计，但

至今官方没有公布确切数字，也没有见到个人的像样的道歉、反思或忏悔！

经历过那段历史的人，事隔四十多年再来重读《我给毛主席戴上红袖章》，那字里行间透出来的源于《炮打司令部》的“火药味”，仍然令人胆战心惊。毫无疑义，此文是红卫兵写的。这里说的红卫兵，不仅指那些最早的高干出身的红卫兵（有人称他们“老红卫兵”或“老三届”），也包括非高干出身的红卫兵，还包括没有参加红卫兵组织的与红卫兵站在同一战线的人（如年轻的记者）。但是，从文章的思想感情来看，最可能是高干出身的老红卫兵，不是她／他们自己执笔，就是他人替她们执笔。至今没有人承担责任，就是所有这一群人都有责任，这一群人都应当拷问自己的灵魂／扪心自问。

卞仲耘是被女附中的红卫兵打死的，没有人出来承担责任，就是这一群人中的每一人都有责任：你一拳，我一脚，她一铜头皮带，她一带钉子的木棒……最终人死了；谁打死的？就是那给了一拳、一脚、一皮带、一棒……的人，以及领导、教唆、纵容了这些人的人，包括旁观者／看客。所有这些人都应当反思，都应当拷问自己的灵魂。我绝无把罪责半斤八两地分摊给每一个人的意思，无可否认，主要责任者是那施了恶性暴力的人，但旁观者的沉默／麻木就是对恶性暴力的纵容。在咱们中国，这样的人太多了，这是文革得以发生，并延续了十年之久的原因。别忘了，正是“看客”的麻木，促使鲁迅先生弃医从文来拯救中国人的灵魂的——源远流长的中国国民性！

想一想鲁迅先生在九十多年前说的话，会对你们的反思和拷问有帮助：“中国倘不革命，阿Q便不做，既然革命，就会做的。”（见鲁迅《阿Q正传的成因》，这里的“做”是指参加革命党，做他所认为的革命的事）；在那种情况下，“我未必无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几片肉，现在也轮到我自己，……”（见鲁迅《狂人日记》）

叶维丽在《我看卞仲耘之死》中说：“宋彬彬确实成了红卫兵的脸”。“而这个‘宋要武’正好来自刚刚打死校长的学校，还有什么能比这更说明问题！‘宋要武’顿时成了一个鲜明的符号，一个浓缩的象征，在很多人的心目中，它代表的是以干部子女为主体的‘红卫兵’的蛮横、暴虐，对生命的极端漠视，和对法制的任意践踏。”说得对。不过，说红卫兵是“对法制的任意践踏”就不恰当了，那时有何“法制”？是“无法无天”（毛泽东语），他就是天，他就是法。叶维丽接着说，“如果一定要在文革初期的女附中找出一个学生‘头儿’，这个头儿应该是刘进，不是宋彬彬。”这也不错。那么，既然如此，为什么人们只提宋彬彬而不提刘进？那是由于毛主席和宋彬彬，一个给他戴上红袖章，公认他是红卫兵的红司令；一个赐她以“要武”的桂冠，赋予她／红卫兵“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特权，于是宋彬彬／宋要武就自然而然成了红卫兵的典型代表／政治符号／象征／“脸”。这样说并无“妖魔”她的意思，更无要她“背负……十字架”的意思，只是反映了一个客观事实。既然历史已经造成了这个事实，你／宋彬彬就应当以自己的勇于承担责任，以深刻的反思和忏悔，来表明你已经还原为宋彬彬，并以此带动其他红卫兵的反思和忏悔。这样，你必能获得内心的安宁，才能过上你所希望的“平静的生活”，否则，错误／罪过只会永远跟着你。

既然是“拷问”，就会有痛苦，你不是早就知道干革命必须“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吗？听说，你现在已信了佛。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了？佛家有句箴言：“人生最大的敌人是自己”。你们的红司令一再教导“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但是，最重要的“与自己斗，其乐无穷”，他有意隐去了，因为他是从不“与自己斗”的。每个人的灵魂里都有两个“我”，概莫能外。你的灵魂里，一个是彬彬，一个是要武，彬彬向要武宣战吧！

第四个问题：我们应当如何面对历史、反思历史？

在上个问题写完时，我想收笔了，主要的罪责不在这些当时只有十几岁的孩子。要往下写，必然要进入更深的层次，那是我力所不及的。更重要的是，这必将牵涉到，“卞仲耘是被她自己所培养的学生毒打致死的”，这样一个很残酷的命题，且不说要继续往她们的伤口上撒盐，也要继续往我自己的伤口上撒盐。

然而，再次看完你文章的最后两部分后，我又拿起了笔。

在“我为什么参选‘荣誉校友’”部分中，你是欲谈又止，看来你灵魂中的两个“我”是有斗争的，但最终是“要武”胜利了，说文革还可能重演，绝不是危言耸听，尤其是在中国已进入红卫兵时代的今天。也许你仍然认为毛泽东“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的预言是正确的？即使你铁了心不再回国，你和你的孩子及孩子的孩子，尽可以悠哉游哉地在你们的红司令曾要打倒的帝国主义国家里尽情享受资本主义的自由幸福，可在你的祖国，还有数以亿计和你的孩子一样无辜的孩子！作为一个母亲，你的爱心哪里去了？佛教徒是要普渡众生的啊！

“爱心”！早在你们的灵魂还是一张白纸时，“爱心”就已经被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了。你们头脑里所有与“爱”有关的神经细胞都已经死亡，有了这样的前提，文化大革命才得以顺利展开的。鲁迅不会没有“爱”，他以最深沉的“爱”来鞭笞中国人的劣根性，爱之深，鞭之切。他说，“我们民族最缺乏的东西是诚和爱，换句话说，便是深中了诈伪无耻和猜疑相贼的毛病”。你们的校长卞仲耘不会没有爱，她是从“旧社会”过来的，孩提时受的教育，早已经把她头脑中有关“爱”的神经细胞都连接起来了，斩不断的。她入党后，必须以党性来改造头脑中的“人性”，改造“爱”，可是收效不大，她仍然怀着慈母般的爱心来栽培你们，教育你们；怀着爱心来办学，按照毛主席的要求，把学校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要你们“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学生”；即使眼看着自己很可能会成为“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时，她仍然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动员你们参加文化大革命。可是，你们却还她以“恨”……

8月5日那天，当卞仲耘被你们摧残折磨得奄奄一息，而神志尚清醒时，她一定在深刻反思，沉痛忏悔：……哎哟！……孩子，我给你们的是甘甜的雨露，温暖的阳光，希望你们都成为毛主席的好学生，为什么你们却……为什么啊，为什么？为什么会这样……在5月9日那天，我还给你们做报告，动员你们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哎哟！原来！原来，我给你们灌输的竟是“狼奶”……孩子，我对不起你们。哎哟！不怪你，连我都不明白，我自己做的是什，你更不能明白你在做什么……教育，中国的教育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从教育方针，到教育思想，到教育内容，到教育方法，到教育制度，……哎哟！孩子，你们白纸般的灵魂，遭到了污染……孩子！……还有很多很多幼稚单纯的孩子，无辜的孩子……灵魂没有受污染的孩子还有吧？……哎哟！快！救救孩子！快！快！但愿他们不再吃这些狼奶，但愿他们都不会成为狼孩，但愿他们都不会遭受我所遭受的灾难，每一天都幸幸福福，哎哟！快快乐乐，……救救孩子！这就要，改变，改革，从教育制度，到教育结构，到教科书，……必须，从政治制度开始……她终于醒悟了，可是，一切都已经太迟了！

可怜的卞校长，这个为孩子的健康成长耗尽了心血的校长，是在肉体 and 心灵的双重折磨中死去的，多么残酷的现实！过去，在万恶的封建制度下，无论多么重的罪犯，在被执行死刑之前都会得到一顿美餐，使他对人世的最后记忆是美好的。然而，在人民当家作主的时代里却是……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过去，没有过这样的事，将来呢？……

将来？将来是从过去走来，由现在开始，走向明天！如果忘记了过去，就不会有美好的将来；如果今天仍然不能直面昨天的罪过，仍然不能深刻反思、沉痛忏悔，悲剧就会在明天重演。

按照叶剑英1978年12月13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的说法，文化大革命整了一亿人，死了二千万人，……被整的和死亡的人数加起来相当于日本的全国人口！官方说，这是十年浩劫；有人说，这是十年疯狂；有人说，这是十年造孽……这巨大的罪孽，难道是一个人或那四个人能制造出来的么？在这十年中，无论是左派、右派，还是中间派、逍遥派，无论是造反派、保皇派，还是看客派，都自觉不自觉地、怀着各种目的、以各种方式参加了运动。十年疯狂，事实上是全民疯狂，每一个人都有意无意地吃了别人的肉，而那一个人和那四个人，不仅吃了别人的肉，还吃了亿万人的灵魂！因此，每一个人都应当深刻反思。

这场浩劫，毛是要它成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为了达到所有人都不能幸免的目的，他使用了一切可以使用的手段，主要是从折磨肉体入手，来摧残精神/灵魂；此外还有，狠斗“私”字一闪念；还有，学习毛泽东著作要在“‘用’字上狠下工夫”；还有“斗私批修”，“批林批孔”等等，无论地位多高，工作多忙，都不能幸免。在这十年中，几乎每一个人都失去了灵魂，失去了思想自由，丧失了独立人格，成为臣服于他的奴隶。不同的只是，一部分人——害人者，是心甘情愿地，甚至是欢天喜地地把自己的灵魂交给了他，然后按他的旨意去强迫另一部分人——受害者，交出灵魂。敢于不服从者，格杀勿论！有一首当年的民谣，对这场“灵魂大战”作了形象描述：“站不完的队，请不完的罪，写不完的检查，流不完的泪”，这便是这场大革命要达到的目的。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不同，文化大革命的所有暴行，都是炎黄子孙对炎黄子孙所犯下的罪孽——自相残杀，因此，在保留历史纪录之外，还应当对咱们民族的灵魂进行救赎。因此，每一个人都应当反思，都应当忏悔，都应当拷问自己的灵魂。

文化大革命把中国自秦始皇以来的两千多年皇权专制统治/极权统治的毒液浓缩为十年，使人们能够清楚地比较深刻地看到文革之所以能在中国这块历史悠久的土地上发生并蔓延的根源。因此，亲历了这场浩劫的人，都有责任把灾难化为财富，经过反思和忏悔，把经验教训留给后人，使中国不再发生这样的悲剧。

你/你们，作为文革中最初的害人者，有责任成为拷问灵魂的榜样。四十多年过去了，你们已经不是孩子，而是孩子的母亲或祖母了。也都曾在“上山下乡”运动中，在社会的最底层接受了洗礼。早已大学毕业，有的成了硕士、博士，有的还留过洋，见识了“洋国”的真实，了解了“洋人”的心理/灵魂。然而，你们竟没有完成“自己解放自己”的转变，因此，写出来的反思文章是……还是请你们自己来概括好了，我无权审判别人。我只能就事论事地对一些问题谈我很不成熟的看法。你有一句话说得很对，“文革的阴影还远远没有散去”，你、我、他、她都有责任使文革的阴影彻底散去，让我们以平等的身份来探讨一些问题吧。

你/你们说，“现在我认识到，这种对生命的集体性漠视也是发生悲剧的重要原因。”仅仅是对生命的漠视？那么，狗也是生命，把一条狗折磨致死，也是对生命的漠视！何况，如果狗是你的宠物，你会折磨它吗？你们是人，是用“阶级斗争”理论武装起来的人！难怪巴金老人一再发问，“为什么一夜之间，人变成了兽”（大意）？

你说，“女附中的‘八五事件’，是长期以来‘阶级斗争教育’的产物。”不错。不过你又说：“在那个年代自己满脑子想的都是保卫党、保卫毛主席，不让资本主义复辟，都是响应党的号召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自觉地在阶级斗争的大风浪中经受锻炼。”这等于是说：我们的动机是好的，是好心办了坏事。你竟然不能说出这样一句话：阶级斗争、阶级仇恨成功地塑造了我们这一代人的世界观和性格！

你/你们提到这样一件事：“在美国许多大学图书馆看到了一本美国出版的关于性学的研讨文集，这本书是西方许多大学的参考书。书中有一篇美国学者 Emily Honing 的文章，内容

以女附中 8 月 5 日事件为例研究女性暴力……连为此书作序的一位世界著名的性学权威，也在序言中专门挑出 Honing 的文章，以我和我父亲为例来讨论问题……”（见《另一种陈述》）这些洋人真是岂有此理！当年我们是抱着使红色中国永不变色的崇高理想闹革命的，与“性”风马牛不相及……且慢！辱骂和耻笑决不是战斗！还是先弄清楚，他们为什么要从性学角度来研究 8·5 事件。有一种思维方法，叫“换位思考”，要求思考者设身处地站在别人的立场，从另一角度来思考问题。这种思维方法，中国早就存在，不过，也许是因为这种方法很有用的缘故吧，在中国，在中国的教育中从来不把它作为一种思维方法提出来。现在，让我们一起来换位思考。这些洋人，是在基督教文化的熏陶中长大的，基督教的核心思想是“爱”，是“爱人如己”，现代社会的平等、博爱思想就是源于基督教的。因此，面对 8·5 事件，他们会产生不少疑问。由于中国历来有隐恶扬善 / 家丑不可外扬的传统，加上“解放后”共产党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他们对中国知之甚少，只知道，中国没有尊重女性的传统，如，强迫女人裹小脚；如，世人共知的“国骂”源远流长，文革中还被红卫兵发扬光大；如，许多被压迫的“媳妇熬成婆”后，仍然要压迫她自己的媳妇……如果说这些都是该破的“四旧”，那么在这“破四旧”的大革命中，为什么还会发生那样伤天害理的事情？女校学生 / 女性竟然打死像母亲一样培养教育她们的女老师 / 女校长？如果说她们尚未获得“解放”吧，可她们都是用枪杆子建立了“新中国”的高级干部的女儿……中国到底怎么了？女性是“爱”的载体，造物主在赋予女性延续人类、生儿育女的使命时，也赋予她们以爱心……这个女校到底怎么了？这个女校是用什么来教育这些女孩，使她们丧失了善良、温柔、富于爱心的本性，变得如此肆无忌惮、野蛮、暴虐的？莫非是“女子无才便是德”？莫非是她 / 她们的父亲把拿枪杆子闹革命的基因遗传给了她们？……把这些问题加以浓缩，不就是你 / 你们追问自己的，“为什么当年北京最出色的女校的学生，会做出如此伤天害理的事情”？你 / 你们本应当也能够以自己的深刻反思来回答他们提出的问题的，然而，你 / 你们却误导了这些并无恶意的洋人，要他们向中国的错误道歉！向你们的罪恶道歉！

叶维丽写《我看卞仲耘之死》，是从批判美国人哈里斯先生开始，以纠正“文革研究中一些带有普遍性的倾向”结束的。这带有普遍性的错误倾向，便是以“后面发生的事情倒过来影响已经发生了的事情。”后面发生的事情是不可能影响前面已发生的事情的，这是一个客观事实。但是，在中国这样一个“黑箱作业”的社会里，尤其是在文革时期，那些本质的真实的东西常常被决策者、被既得利益者、被出卖灵魂的御用文人等等，别有用心地掩盖着，人们看到的只是事物的表面现象，甚至是假象。在这种情况下，真正的历史研究者，就必须从已经公开的（无法掩盖的、或者是虚假的）后面发生的事情所提供的线索入手，来寻找前面的尚未浮出水面却在暗中起着作用的本质和真实。你是引用一位美国的中国史学者柯文先生的话来说明你的观点的，我也引用一位洋先生的话来说明我的看法，这位洋先生是法国著名作家布罗代尔：“看历史，不能被种种事件的浮器泡沫迷惑，而要看到泡沫下的流水。”说简单明白些就是：必须透过表面现象（常常可能是假象）抓住本质，尤其是在历史真相没有浮出水面之前。

紧接着你说：“在中国文革史的书写中，这个现象可以说比比皆是。不说别的，就说对林彪的研究，一个‘九一三事件’，就抹煞了历史上的林彪和他的战功，明明会打仗也成了不会打仗。”请你不要忽略一个事实：这是决策者或既得利益者的有意抹煞或歪曲，能这样做也敢于这样做的是一些无耻的御用文人，一个有良知的历史研究者决不会做这种事。在海外生活的你们，应当知道，最先把真实的林彪公开出来的，并不是你们所无限崇拜的红司令、或伟光正的共产党、或这一党专政的政府，而是生活在海外（包括港、澳、台）的中国人或非中国人。这其中的原因你不会不知道。你也应当知道，法国的卢梭说过这样的话：“你若是想为祖国的真正利益写作，你就不应该到祖国的怀抱中去写。”（见卢梭的《忏悔录》）因此，你应当向有意掩盖事实真相的当局呼喊：我们有知道历史真相的权利！我们不要那些充斥谎言和欺骗的历史材料 / 历史课本！而不要把矛头指向那些为了拒绝遗忘，想尽办法突破禁区，寻找真相的普通中国人。

众所周知，自从1949年“解放后”，中国的历史已经成为统治者的政治工具，他们经常用歪曲了、篡改了的甚至是伪造的历史来教育人民，使人民始终处于不了解历史从而就不了解现状的“愚民”状态之中，以巩固他们的统治地位，或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你们本身就身受其害。你们所熟知的万恶的大地主刘文彩的故事（包括电影和泥塑群《收租院》等）就是典型，这才是真正的“好故事未必是好历史，事实上，好故事往往不是好历史。”的典型！不知你们现在是否到刘文彩的故乡去做过实地调查？应当去的，肯定会有帮助。统治者坚信：只要掌握了对过去的解释权，就能够牢固地控制现在，而如果能够牢固地控制现在，未来就必然在他们的控制之中。这才是“使历史丧失了公信力”的根本原因；这也是文革前夕，“上面”下令在中小学，停开历史课，把语文和政治合并，并把毛泽东著作作为基本教材的根本原因；这也正是使你们丧失了独立思考能力，丧失了独立人格，跟着那个“别人”去“闹革命”的根本原因。作为过来人，你们应当理解今天有良知的中国人要努力寻求真相，还历史以真实的苦衷，你们应当设法帮助她／他们，而不应当用他们的少数差错来责怪他们。

作为第一个学生把老师／校长残酷折磨致死的学校，师大女附中这个曾经炫耀一时的“红色要武中学”有责任成为反思的榜样。可是，在90年校庆时，你们有把卞仲耘校长被折磨致死的血淋淋的事实展示出来吗，有把学生们反思和忏悔的文字展示出来吗？你们所展示的是什么？莫非你们还要继续给幼稚单纯的孩子们灌狼奶，让“狼孩”源源不断地从北京最出色的女校（现在可能不是女校了？）中生产出来？也难怪，“文革的阴影还远远没有散去”，你们既没有亲历过文革，又找不到能够真实地深刻地反映文革的书籍或其他资料，何况，时间、条件不同了，就会是另一种思想感情了。现在，为了不让卞仲耘的悲剧在你们或你们的晚辈身上重演，还是必须用换位思考的方法来思考：如果在文革时，你是这所学校的教师／校长，你会有什么遭遇？你会幸免于难吗？如果卞校长现在还活着，会像你们这样庆祝90周年校庆吗？如果她还活着，她会这样庆祝女附中的90周年校庆的：最重要的，是修改你们编写的《90年辉煌……90年图志》。首先，要把“90年辉煌”，改为客观陈述的语气“XX（那时不会是90年了）年的路程／历程”，里面一定要专设文化大革命一章，标题应当是“沉重的／蒙羞的一页”，里面必须有宋彬彬给毛主席戴袖章的照片，及学生／红卫兵参加文化大革命的照片；也必须有卞校长及老师们被折磨殴打的照片，还必须有学生／红卫兵反思和忏悔的文字，哪怕只是打了一拳，踢了一脚，吐了一口吐沫。到那时，还应当有宋彬彬在90年校庆时上了“荣誉校友”榜的历史事实，以及后来反思错误根源的文字；还必须有王友琴历尽艰辛寻找历史真相的事实。如果女附中有“校史展览室”，也应当展示这些内容。这些都是历史事实，不容粉饰，不容掩盖，更不容篡改。只有弄清事实，才能反思，才能“以史为鉴”。

其次，听说，你们已把校名改为“实验中学”，还为我卞仲耘立了一个纪念铜像（见《我看卞仲耘之死》的附图），说“她的名字应该被历史记住”。如果校长／老师被学生毒打折磨致死的事实及其根源还没有弄清楚，就在这血淋淋的土地上孤零零地立一个“束手无策”的前校长，你们要历史记住什么？你们要今天的学生思考什么？这“实验中学”要实验的又是什么？如果是真心真意为了不再重蹈覆辙，就请你们把校名改为“爱的中学”，并把爱施与普通的平民百姓子女，不要仅仅招收权贵们的子女；如果是真心真意为了不再重蹈覆辙，就请你们把这孤零零的铜像搬走，然后，在校门“爱的中学”几个大字的后面，立一块长方形的塑有浮雕的影壁。浮雕的内容是，一个面向观众伸开双臂保护她身后的许多孩子的女人／女教师——一个群体，保护千千万万未受污染的孩子的灵魂是她们的职责；影壁前方，立三个长跪的女学生／红卫兵，面对女教师正在反思和忏悔，她们也代表一个群体。我的学生叶维丽在一篇文章的最后问得好：“我们要做的不是去‘抓凶手’，而是每个人面对自己的良知……我们是否曾扪心自问？”（见《我看卞仲耘之死》）但是，这段话的头一句错了。连“凶手”都不知道，就不知道真相，谁来反思？怎么反思？我们的目的不是“抓凶手”，你们的目的也不应当是“澄清”，咱们共同的目的是为中国留下一些真实的历史，深挖罪行／错误的根源，要反思，要忏悔。

再次，由于这是一所学校，为了使这段历史能起到警示教育者和被教育者的作用，文字说明必须深刻、清楚地写出教育在文革中所扮演的角色；同时开设公民课，把这段历史作为反面例证放到公民课的教材中去。教育不能没有“爱”，教育的作用是为了培养真、善、美的人性，使人的兽性少些，人性多些。可是解放后，中国的教育却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我不可能在此全面说明，谨提供几段导师的论述给你们参考。恩格斯早就说过，“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人永远不能完全摆脱兽性。所以问题永远只能在于摆脱得多些或少些，在于兽性或者人性程度上的差异。”马克思再三指出：“专制制度必然具有兽性，与人性是不相容的。兽性的关系只能靠兽性来维持。”还说：“专制制度的唯一原则就是轻视人类，使人不成其为人。专制君主总把人看得很下贱。”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共产党人并没有发明社会对教育的影响；他们仅仅是要改变这种影响的性质，要使教育摆脱统治阶级的影响。”

如果你们觉得这种思考的难度太大，力不胜任，那么，把上述方案推倒，采用另一种更简单，也许会更有用的方法。先说说我的思考过程：你们可能知道杨恒均先生？他的父亲这样评价自己教过的老三届学生：“被那样洗过脑的人是不可救药的，得等到他们也死去，中国才有希望。”（见杨恒均《生日感怀：后悔做过，以及后悔没有做的那些事儿》）教育的周期是很长的，但他如此赤裸裸地说出“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道理，实在使人丧气，使人难以接受。难道他们就这样不可救药？难道不能把周期缩得短些？一天，我在2012年第4期《炎黄春秋》杂志上，看到吴思的文章《德国人如何对待历史》，我忽然豁然开朗。现在，我把有关文字贴于下面：

“在德国许多城市的老建筑门前，经常可以看到地上镶嵌着几块巴掌大小的铜制地砖，略微凸起于地面，上边刻着某某人曾经住在这里，还有此人的生卒年代。好像一块微型纪念碑……这是纳粹时期这个建筑物里受迫害的居民姓名……德国艺术家古特尔·戴姆尼首创，后来发展为‘绊脚石运动’。中小学生们也参加进来，调查这段历史，确认受害者的姓名和住址之后，在企业和公民的资助下，制造并安放黄铜地砖。柏林大约安放了七千多块‘绊脚石’。中小学生的绊脚石运动。让历史凸显在当代人脚下。‘我们是谁’的答案，开始由新一代公民去追寻和回答了。”

咱们中国也必须来一个“绊脚石运动”！只有所有人（主要是当年的害人者和受害者）尤其是当今正处于生命危险期的学生/孩子，都一起来调查这段历史，反思这段历史，才可以在比较短的时间内消除文革的阴影，使中国更美好的明天尽快来到。若认为可行，还必须抓紧时间，因为留给当年的受害者的时间越来越少了。我只在此提供一条思考的途径，有许多相关的问题，还得靠集思广益。

你们应当知道有名的“华沙之跪”？1970年12月7日，当时的西德总理勃兰特访问波兰，当他在主人的陪同下前去凭吊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纳粹屠杀的犹太人陵墓时，在众目睽睽下他突然自动跪了下来，长跪默哀，……勃兰特既没有参与屠杀犹太人，犹太人也并非因他而死，相反，二战期间还是反纳粹的地下抵抗组织的成员，他为什么要如此？无罪负疚！面对无数亡去的冤魂，他不能不为自己民族和同胞曾经有过的罪行负疚，他无可选择地以下跪来表达了自己的忏悔，跪的忏悔！全世界都为勃兰特的下跪而震惊，而动容，饱受纳粹蹂躏的波兰人民更是感动得热泪盈眶。此一行动被誉为“欧洲近一千年来最强烈的谢罪表现”，他跪出了“人”的尊严。勃兰特因此获得1971年诺贝尔和平奖。有那样的德国人，就有那样的总理勃兰特；有那样的总理勃兰特，就有那样的德国人。而咱们中国呢……

你们/红卫兵们，为你们的罪行向老师/校长跪下去吧。

动笔于2012年3月 完稿于2012年6月

□ 原载《爱思想》网站

~~~~~  
【史海钩沉】

## 恐怖的“红八月”

• 王友琴 •

1966年9月5日，领导文革的“中央文革小组”发出了一期“简报”，标题是“红卫兵半个月来战果累累”。简报说，到8月底止北京市有上千人被打死。从简报的标题就可以看出，打死上千人被当做红卫兵的“战果”受到赞扬。

本文将报告1966年8月的暴力迫害，并做简略分析。文中事实来自笔者的调查采访。

### 一、从打老师开始

1966年6月1日晚，电台广播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从第二日起，北京的大学中学停止了日常课程，用全部时间来“揭发”和“斗争”学校的领导干部及教师。先是用大罪名如“黑帮分子”“三反分子”等对他们作“口诛笔伐”，紧接着开始使用脏话咒骂。到6月中下旬，很多学校里出现了殴打校长和教员的情况。

1966年6月18日，北京大学数十名教员和干部遭到游街、戴高帽子、撕破衣服、在脸上抹黑墨、罚跪和扭打等等。两天后，当时的国家主席刘少奇做出批示要求制止这种“乱斗”（不是说“不斗”）。后来他被指责为把文革搞得“冷冷清清”。7月26日，江青在北京大学的万人集会上宣布6月18日事件是“革命事件”。自此，暴力殴打“阶级敌人”（当时称此为“武斗”）立即开始流行。

北京大学附中成为北京市最早对学校的领导干部和老师进行野蛮殴打的地方。副校长、化学老师刘美德（女）被剃了“阴阳头”（剪去半边头发），被强迫在操场上爬行。还有红卫兵把脏东西塞进她的嘴里。有一天她被拉上一张方桌跪下，一个红卫兵站在她身后，把一只脚踩在她背上，由一名记者照相以后，那个红卫兵把她从桌子上踢了下来。当时刘美德怀孕已经很明显。她的孩子生下不久就死了。红卫兵还用塑料包裹的铁条打她和其他老师。她说，那种铁条打在身上，伤痕不明显，但是“疼得钻心”。

“武斗”普遍化的同时，“红卫兵”组织在全国兴起。8月1日，毛泽东写信向清华附中“红卫兵”和北大附中“红旗战斗小组”表示“热烈的支持”。二者都是在6月2日出现的学生小组，都积极“批斗”原学校干部、教员，并集中攻击文革前的教育体制，大力鼓吹血统论。1966年8月是红卫兵运动的高潮之月，在全国各学校都建立了红卫兵组织。他们被称为“革命小将”，在文革初期是暴力迫害的主要力量之一。

### 二、卞仲耘校长——北京第一个被红卫兵打死的人

在北京，第一个被打死的教育工作者，是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今实验中学）的副校长卞仲耘。时间是1966年8月5日午后。同时被毒打的还有该校副校长胡志涛，刘致平，教导主任梅树民，汪玉冰，一共五人。校级领导人中，只有一名农民出身平日不管教学只管总务的副校长没有被打。在长达三、四个小时的殴打和折磨中，包括用带钉子的木棒打和用开水

烫等残酷手段。卞仲耘死亡，她的身上遍布青紫，还有几十处血窟窿。另外四人也受到了骨折等重伤。

在北京第二个被打死的，是北京101中学的美术教员陈葆昆。时间是8月17日。一起被打的还有该校十多名教员及领导干部。他们被强迫在煤渣铺的校园小路上用四肢爬行，双手和膝盖鲜血淋漓。一名目击者说，爬行过程中，有一红卫兵用穿着军用皮鞋的脚踩碾一名女教师的手指。陈葆昆被迫害致死。

在卞仲耘被打死的同一天发出的中央〔66〕395号文件，撤销了刘少奇关于制止“乱斗”的310文件。这个文件只有一句话：“中央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日批发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是错误的，现在中央决定撤销这个文件。”这等于是给红卫兵颁发了暴力许可证。

### 三、8月18日集会和暴力升级

1966年8月18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百万红卫兵的盛大集会。普通红卫兵在广场上挥动小红书高呼万岁走过天安门下。红卫兵领导人则登上了天安门城楼。从照片上看，这些红卫兵领导人几乎全是高级干部子弟。大会向全国实况转播。在城楼上，北京大学附中红卫兵彭小蒙（毛泽东8月1日的信中提到她的名字）代表红卫兵讲话。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红卫兵领导人宋彬彬给毛泽东戴上了红卫兵袖章。毛泽东问了她的名字后，发表评论说“要武嘛”。会后，《光明日报》《人民日报》发表了《我给毛主席戴上了红袖章》一文，文中注明宋彬彬已经改名为“宋要武”。这个学校的红卫兵还把学校的名字改成了“红色要武中学”。

北京大学附中是北京最早开始大规模暴力行为的学校之一，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是北京第一个打死人的学校。彭小蒙和宋彬彬在8月18日大会上的瞩目位置，其中包含的旨意十分清楚。8月18日大会前，在北京被红卫兵打死的教育工作者有二人。8月18日会后，被打死的人的数字急剧增长，红卫兵暴力在规模上和程度上全面升级，以致到了8月底，有上千北京和平居民被红卫兵打死了。

8月19日，北京第四、第六、第八中学的红卫兵在中山公园音乐堂“斗争”北京教育局和这三所中学的领导干部。二十多人跪在舞台上。第八中学的副校长温寒江，脖子上套着一根绳子，从两公里外的学校一路跑到中山公园去，绳子的另一端牵在一个骑自行车的红卫兵手里。他被打得浑身是血，昏厥过去。教育局长孙国梁被打断三根肋骨。其他人被打得头大如斗，面目全非。从那时候起，剧场和体育馆这些文化场所变成了召开暴力“斗争会”的野蛮血腥之地。

8月19日晚，北京外国语学院附中（在和平门）红卫兵打死了教员张辅仁和张福臻。为了试验他们是否已经死亡，红卫兵先用冷水浇，又用开水烫，看到尸体全无反应才罢手。该校当时有二百名教职员。该校红卫兵负责人在大会上声称这是“杀二儆二百”。

北京第三女子中学（后改名为159中学）的红卫兵从8月19日开始连续殴打和折磨校长沙坪。在学校西小院里，红卫兵用皮鞭和捆着带钉子的木棍等，拷打沙坪到深夜。20日上午，奄奄一息的沙坪被拖到学校中院，在有全校师生参加的“斗争会”上，在一千六百多人面前，被殴打至死。“劳改队”中的十多名教师和干部也跪在沙坪旁边一起被“斗争”。红卫兵不断揪沙坪的头发令她抬起头来，她的头发被薅下来。散会后，中院地上有一堆头发；旁边还有一摊血迹，是校长熊易华的。她跪在沙坪旁边，头上压了三或四块砖头，额头被打破。数学教师张梅岩（女）被抄家后服毒身亡。体育教员何世瑾（女）自杀。一位目击者说，她后来还看到打死沙坪的红卫兵（女生）在西城区委大院里挥舞铜头军用皮带打人。

北京宣武区梁家园小学校长王庆萍，在8月19日遭到“斗争”和毒打后被关在学校。她在20日早晨坠楼身亡。她被宣布是“自杀”，虽然没有遗书。她有三个孩子，当时8岁9岁11岁。她的大儿子说：妈妈一定是被推下楼去或者是被打死了扔下去的。如果她自杀，她至少会给我们孩子写信留话。

8月22日，在北京第八中学，学校负责人华锦（女）被打死。副校长化学老师韩九芳（女）背上被打出两个大洞，引起败血症。她的家人设法救活了她，但是留下严重后遗症，终身致残。历史老师申先哲被打后自杀。初一的班主任赵尊荣是22岁的姑娘，也被剃了“阴阳头”。

8月24日，北京第十一中学的红卫兵到该校化学教师唐婉森（女）家搜翻，用木棍把她打死。8月26日上午，红卫兵先把一批老教师剪了“阴阳头”，接着在操场上架起火来焚烧学校图书馆的大堆藏书。他们强迫一批教职员围绕火堆跪下，举起胳膊伸向火堆，广播喇叭里大叫“不许后退”，以致他们的手臂都被烤出大水泡。女校长林瑾被红卫兵推到火堆上，整个手臂被烧伤，40年后伤痕犹在。该校图书馆员沈世敏（女）被剪了头发并在火堆边被烧伤，到医院被拒绝治疗，当晚在家中上吊自杀。数学教师杜兆南被指为“逃亡地主”遣返回乡，卧轨自杀。语文老师王景清跳楼。数学老师李泮请和妻子一起在家中上吊。校医霍岐服安眠药身亡。工友林士慧和陈玉和服毒。这个学校有八人被害。

8月25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第二中学红卫兵在校中打死了三个人：靳正宇，语文教员；姜培良，党支部书记；樊希曼（女），学生曹滨海的母亲。校长高云被命令站在毒日头下，额头上被扎了一排图钉，还被用沸水浇。

9月8日，在北京第二十五中学，语文教师陈沅芷（女）在关押中被打死。除了打她，红卫兵还把她推到架起来的两张桌子上面“斗争”，然后把叠起来的桌子推翻，让陈沅芷摔下来。这个学校的红卫兵还打死了一名校工。

在北京第五十二中学，语文教师郑兆南（女）被关押在学校，饱受殴打和各种折磨。她死于1966年9月8日，时年36岁。

在北京师范学院附属中学，喻瑞芬（女），一名生物教师，在教师办公室里被击倒在地并被毒打。接着，在光天化日之下，她被倒提两腿拖出楼门，她的头在水泥台阶上磕击碰撞。一桶沸水浇在她的身上。在楼门口的空地上她继续遭到殴打和折磨。两个小时后她死去了。打人者还不满足。他们强迫所有在“牛鬼蛇神队”中的老师围绕喻瑞芬的尸体站成一圈，轮流打她的尸体。

在北京景山学校，传达室的工友李锦坡被打死。

位于北京宣武区的白纸坊中学（文革中改名为138中学）负责人张冰洁（女）被打死。她恳求红卫兵学生：“我有错误，请你们批判。请不要打我。”但是红卫兵继续用沾了水的麻绳和铜头皮带打她，把她打死。

在北京外国语学校，工友刘桂兰（女）在学校礼堂被红卫兵学生打死。教导主任姚淑嬉（女）被剃了头发，被“斗争”和殴打。红卫兵把她和别的老师的头塞进翻转过来的小方凳的四条腿之间，殴打他们。她住在校内，一天晚上来了五拨学生打她。刘桂兰被打死后，红卫兵强迫姚淑嬉和学校“劳改队”中的其他干部及老师抬她的尸体。一位老师说，她和姚淑嬉被强迫各抬刘桂兰的一只脚，当时她真觉得怕极了。姚淑嬉在学校办公楼三楼厕所的下水道拐脖上套了一根绳子上吊自杀。

在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教员杨俊被打死，教员郑之万（女）跳楼自杀。

在北京朝阳区的第四女子中学（现名陈经纶中学），生物教师齐惠芹（女）被毒打致死。这个中学的校长潘基（女），被打得几乎死去。

在北京第十女子中学（文革中改名为157中学），教员孙迪在校中被打死。校长陶浩（女），手被打骨折，成残疾。

北京第四十九中学语文老师郑育秋（女），由于“家庭出身不好”被红卫兵打伤，全身肿烂，抬到第四医院（现恢复旧名叫普仁医院）。医院拒诊。她死在走廊石板地上。

马耀琮，北京南苑红星中学地理教师，8月间被红卫兵打死在校园中。

北京还有一大批中学教育工作者在遭到残酷殴打和侮辱后自杀。高万春是北京第二十六中学的校长。1966年8月25日，该校红卫兵在校中“斗争”了46名教师。高万春被五花大绑，跪在铺有碎石的凳子上。他几次被打翻在地又被拉上凳子再打。高万春在这样的“斗争”之后“自杀”，时年42岁。这个学校同时期还有一名老教师跳楼，幸而未死，摔断了腿。1966年6月7日执掌该校的“工作组”组长李淑铮（女）在“工作组”被下令撤出后也遭到残酷“斗争”，她喝剧毒杀虫剂自杀，幸而及时被送进医院没有死。李培英（女），北京社会路中学副校长，被打并被关在学校中。她浑身被打得血肉模糊，8月27日在关押她的房间的暖气管子上吊死。彭鸿宣，北京工业学院附属中学校长，被打被关，自杀。萧静（女），北京月坛中学校长，她在被毒打后跳烟囱自杀。北京第二女子中学的体育教员曹天翔和语文教员董尧成（女），被殴打侮辱后，跳楼自杀。北京第65中学的化学教员靳桓跳楼自杀。汪含英（女）是北京第四中学的地理教师，被剃了“阴阳头”，她的丈夫苏庭伍是数学教员，当时借调在北京第一女子中学，在被“斗争”、抄家和“遣返”即驱逐出家后，他们夫妇一起在北京的香山服杀虫剂“敌敌畏”身亡。北京第一女子中学的校工马铁山上吊身亡，英语老师傅敏投水未死。白京武，北京第四十七中学美术老师，在该校“劳改队”中遭到毒打后，投河身亡。北京第三中学的语文教师石之琮（女）在龙潭湖投水身亡。北京矿业学院附属中学语文教员朱鸿志遭到毒打后被关在学校教学楼里，夜里在楼外小树林中上吊身亡。房山县房山中学的校长王哲在饱受折磨后“自杀”。王哲死后，红卫兵强迫该校其他“牛鬼蛇神”跪在王哲的尸体前面，一起被“斗争”。北京通县第一中学负责人程珉遭到残酷“斗争”后被逼“自杀”。北京航空学院附属中学一位生物老师割破动脉自杀，姓高，名不详。北京第二中学一级数学教师路彦被驱逐到农村后死亡，地理教师袁之俊和电工师傅许殿举自杀身亡。当年的学生记得许师傅从学校教室楼上头朝地扎下后尸体横陈在水泥地上的景象，记得他穿的是蓝色的衣服。在北京第十一女子中学（文革中改名为165中学），体育教员哈庆慈（女）遭到红卫兵“斗争”和毒打后，在该校后排楼的四楼跳楼身亡。和她一起遭到残酷折磨的有女校长张燕筹和女教师邓婉璐等人。该校还有一名男性工友在同一时期遭到折磨后跳楼。清华园中学的校长项凯被关押在校中，被打得死去活来。该校教军体知识的老师李凯从学校的教学楼上跳下来身亡。

在北京第十九中学，高中语文老师宋继瑞（女），看到别的老师被剃阴阳头，她在宿舍里用绳子把自己勒死，死时三十多岁。初中化学老师阎凤卿（女），父辈几代开照相馆（颐和园照相馆），有很多老照片，被认为是“封资修”的东西，被抄家，她被关在学校教学楼一楼楼梯下的小间里，那里黑不见光，顶是斜的直不起腰，原来用来放扫帚簸箕之类。她在那里把自己勒死。死时只有二十多岁。

退休教师也被打。贺定华（女），66岁，退休小学教员，住在北京安定门外六铺炕地兴居

40号中国农业机械化研究院宿舍北楼二楼。1966年8月27日被外馆中学的红卫兵打死。她头发被剪掉，浑身青紫，头颈上有一道很长的刀痕。她的丈夫姚剑鸣同时被毒打未死，被驱逐到安徽宿松县梅墩乡，1968年7月上吊身亡。

北京第三十中学校长王生琯，被红卫兵学生殴打以后，又被从楼梯上推下来导致死亡。这个学校的中共支部书记孙树荣的眼睛被打瞎一只。北京翠微路中学校长黄国英，被打瞎一只眼睛。北京第三十一中学的党支部书记宋克被毒打和关押后在8月30日服大量安眠药自杀，侥幸未死。北京回民中学校长李玲善被长期残酷“批斗”后精神失常，却被说成是“装疯卖傻”。他在七十年代走失，不知身亡何处。北京航空学院附属中学校长安丰均遭到多次毒打，被打断了三根肋骨。

在北京的大学和小学，也发生了大量暴力行动，总的来说不如中学残酷，但也极其严重。

1966年8月24日下午，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红卫兵派卡车从12所中学运送红卫兵到清华大学（据一名附中红卫兵领导人说是清华大学红卫兵要他们做的），在那里他们殴打了清华大学的学校领导和教授们，还抄了一些人的家。清华大学红卫兵也动手一起打人。在无线电系的几个教师干部被打后，血流在地上。有学生围绕地上的血迹画了一个圆圈并在旁边写了“狗血”两个大字。那一天傍晚，红卫兵拉倒了校园中白色大理石建造的“清华园”牌坊（现在的牌坊是文革后照原样重建的）。他们挥舞棍棒皮带，命令“劳改队”中的教授和干部搬走沉重的石块。水利系教授黄万里那天被剪了“阴阳头”，还跪在地上被打，又被抓到牌坊那里搬石块。那天夜里，清华大学和清华附中的校级干部全部被关在“科学馆”中，被一个一个地拉进一个小房间拷打。

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何万福被“斗争”后，8月13日身带遗书在龙潭湖投湖身亡。8月28日，中文系老教授刘盼遂和他的妻子梁秋色（家庭妇女）在市区西单附近自己家中被红卫兵打死。中文系教授叶苍岑和妻子在该校位于市中心西单的教工宿舍内遭到红卫兵毒打，他的妻子被打死。

北京铁道学院（现北方交通大学）俄语教授张剑飞，家住铁道学院教师宿舍54区二楼，8月27日晚7点钟被铁道学院红卫兵从家中抓走，和另外10名教授一起被毒打到夜里12点，然后被送去海淀公安局关押。他肋骨折断，大量尿血，呼吸困难，在9月5日死亡。在这种恐怖中，该校一名教授和妻子孙启坤（退休会计）逃出学校。8月27日孙启坤逃到城中人民大会堂西侧南文昌胡同六号弟弟孙菊生家中时，在那里被中学红卫兵打死。

北京戏剧学校校长江枫（女）在学校遭到“斗争”，被殴打和侮辱，回到家中又遭14岁的养女殴打后“自杀”身亡。戏剧学校教员、京剧演员叶盛章遭红卫兵毒打，8月30日在北京东便门护城河投河，9月3日发现了他的尸体。

小学教员也遭到侮辱和毒打。8月24日，北京崇文区西花市大街小学教员鄂少琪（女）被“揭发”有“对党和社会主义不满言论”后跳河身亡；永定门小学教员冯杰民被红卫兵“批斗”后用剪刀自杀。北京中古友谊小学的教导主任赵谦光，在被侮辱殴打后从烟囱上跳下身亡。该校校长白智（女），被学生按了一脑袋的图钉。赵香蘅（女），北京史家胡同小学校长，遭到“斗争”殴打，和丈夫沙英一起跳楼身亡。北京芳草地小学校长石子勤，遭到殴打侮辱后，用剪刀戳自己的脑子自戕，幸而没死。在北京第一实验小学，王启贤老师被强迫跪在地上，吃煤渣。在玉泉路小学，有四名女教师被学生红卫兵剃了“阴阳头”。

8月27日，北京宽街小学的校长郭文玉（女）和教导主任吕贞先（女）在同一天内被打

死。郭文玉的丈夫孟昭江也遭毒打，两天后死亡。邱庆玉（女），北京吉祥胡同小学副校长，在1966年10月1日被打死。

校园暴力发生在全国各地。在多年的调查中，迄今还没有发现有一所学校没有发生暴力迫害。

#### 四、“黑五类”学生也被打

在学校里，除了校长和教员，家庭出身是“黑五类”的学生也遭到他们的红卫兵同学的侮辱甚至毒打。红卫兵狂热奉行一副“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1966年8月这一“对联”贴遍各处：学校大门、教室门、黑板、板报栏两侧，无处不在。这副对联最早出现于北京大学附属中学，后来流布全国。8月26日晚，清华附中红卫兵暴打了高三的四名“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还命令他们各写100副“对联”，贴到各处。这一“对联”还做成了“歌”。和另一首强迫所谓“牛鬼蛇神”唱的“嚎歌”一样，这两个恐怖“歌曲”都是北京第四中学的一名红卫兵作的。同时，这副对联也是红卫兵组织成员的资格评定标准。在北京这样的城市，作为城市人口主体的脑力劳动者和商业工作者都不被视为“红五类”，只有不到四分之一中学生被准许参加红卫兵，被授予了欺侮虐待其他同学的特权。

1966年8月4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初二（四）班的红卫兵召开“斗争会”斗争同班同学。在这个班的45名同学中，十名“黑五类出身”的学生站在教室前面被“斗争”，一根长绳子绕过这十名学生的脖子，把她们捆成一串。十名“红五类出身”的红卫兵坐在椅子上。其他既不能算“红五类”也不能算“黑五类”出身的学生则在“斗争会”期间被指定坐在地板上。大标语“打倒狗崽子”贴在教室墙上。他们被命令逐个“坦白交代”他们的“反动思想”以及他们的父母的“罪行”，还必须重复说三遍“我是狗崽子。我混蛋。我该死。”红卫兵用拳头打她们，把墨汁泼在她们身上。该校学生排球队队长杨友丽，因为球队得过全国冠军后受过校长接见以及她父亲是所谓“托洛茨基分子”，遭到“斗争”和侮辱。她服安眠药自杀，幸而未死，但身心受到严重摧残。

在北京一零一中学，红卫兵把校门分成一大一小两个，命令“黑五类子弟”出入只许走小门，并称小门为“狗洞”。初三女学生吴芳芳，父亲是北京航空学院教授吴礼义，当时被当做“家庭出身不好”。红卫兵指控她撕了一张毛泽东纸像。（实际情况是一张毛泽东纸像被风吹落，她正好路过拣了起来。）吴芳芳遭到“斗争”和毒打，红卫兵还把她和上文写到的被打死的美术教员陈葆坤关在一起。她因此精神失常，不清楚人事，不能独立生活，始终由她的母亲照料。

在北京大学附属中学，很多所谓“家庭出身坏”的学生被打耳光被侮辱等等。初一学生万红，父亲在1957年被划成“右派分子”。与她同班的男生红卫兵要打她，她逃入女厕所，红卫兵从厕所拉出来。他们强迫她站在教室里的一把椅子上，用铜头皮带打她。打的过程中还有红卫兵把椅子从她脚下突然抽走，使她摔到水泥地上。晚上不准她回宿舍睡觉，把她关在露天阳台上淋雨。朱同是高三学生，他的父亲是“右派分子”，父母已经离婚，他也改用了母姓，而母亲不是“右派分子”。但是他仍然被当做“狗崽子”折磨。他被关在地上积水的小楼梯间内像动物一样被全校学生“观赏”。有一天晚上下大雨，他逃出了学校，爬着回到家中，因为他被严重打伤已经不能走路。

在清华大学附属中学，有相当数量的“家庭出身坏”的学生被打被欺负，他们的私人物件被捣毁。多名女学生被剃了“阴阳头”。杨爱伦，高一学生，文革前功课和文艺活动都好，“家庭出身不好”。她在班里遭到“斗争”，站在教室前面被推来攘去，被强迫写“交代”，还被关押在学校中不准自由行动。一星期后，8月8日，她逃出学校到附近卧轨自杀，被火车撞成重伤，

幸而未死。高二学生郭兰蕙，父亲在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1966年8月20日是星期六，在红卫兵宣布下个星期一要“开会帮助”实际上是要“斗争”她后，她服毒身亡。

在西城区太平桥中学，红卫兵打死了一名初三的不属“红五类出身”的女学生。这个十五岁的女孩子仅仅因为说了一句“毛主席也不是红五类出身”，遭到红卫兵同学用铜头皮带和棍棒殴打。从下午打到傍晚，红卫兵回家吃晚饭了。她挣扎着爬到一个水龙头边喝了很多水后死亡。她的母亲被通知来校中领死尸，未敢表现出一点怨恨和抵触。

在离北京市中心王府井大街不远的第27中学，一名初中学生被指控把那时必须随身携带的红色塑料封皮的《毛主席语录》本坐在身子底下。红卫兵在初二教室里毒打她。她被打得昏死过去以后，红卫兵说她“装死”，拿碎玻璃往她眼睛里揉。她苏醒过来，继续被打。傍晚时分她被打死。她的尸体被用草席子卷起来运走烧掉了。问到当时的目击者，他们都记得当时的情景，却没有一个人记得这个女学生的姓名。

在中国人民大学附中，“家庭出身不好”的高二学生宁志平被说成“反动学生”。他被关押在学校里，他的一只耳朵被红卫兵割掉。他到医院把耳朵缝了上去。但是几天以后再次遭到红卫兵毒打，刚缝上去的耳朵被打落。他永远失去了他的耳朵。

1966年8月25日，曹滨海，北京师范大学附属第二中学高三的学生，和前来他家抄家的同班的红卫兵发生争执。据说他拿菜刀砍伤了一个红卫兵同学。结果，曹滨海被公安局关起来，曹的母亲樊希曼在那天被红卫兵抓到学校中活活打死。曹滨海因此精神失常，以后从未恢复正常。

在北京第十三中学，学生任春林“家庭出身不好”，他喜欢书法，在旧的《红旗》杂志上练习毛笔字，被该校红卫兵学生发现在毛泽东的名字上写了“墓”字。红卫兵抄了他的家，把一条铁链拴在他的脖子上，强迫他从家里像狗一样爬到学校的“红色刑讯室”中。他被关押在那里并且被多次毒打。那个“红色刑讯室”中关押着该校的校长和一批教员，还有一个所谓“黑五类子弟”、初中三年级学生武素鹏。红卫兵把武素鹏捆在一条麻袋里，用民兵训练用的木枪狠打，把他活活打死。

在北京第六中学，高三学生王光华出生于“小业主”家庭，他未得到红卫兵的准许就去外地“革命串联”。他在1966年9月27日回到北京，立即就被抓进学校的监狱之中。他在那儿被十多个红卫兵几次毒打。王光华死于第二天，9月28日，时年19岁。红卫兵命令几个在这个监狱中被关了一个多月的老师把他的尸体抬出了监狱，放进火葬场的运尸车。

由于“红卫兵”组织拥有如此地位，“冒充红卫兵”当时成为大罪名，竟然可以被当做打死人的“理由”。北京师范学院附属中学的红卫兵打死了该校数学教师田钦的弟弟田悦，123中学的学生，他被指控为“冒充红卫兵”。

## 五、一批房产主被打死

8月22日《人民日报》头版报道红卫兵的“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特别介绍了北京第二中学红卫兵广为张贴的“宣战书”。红卫兵开始到处烧书，烧画，破坏文物，以及开始大规模的抄家行动。红卫兵强迫市民交出他们存有的所有黄金和白银，还在抄家过程中打死了许多所谓“阶级敌人”。北京早已不准“地富反坏”居住，被红卫兵打死的“阶级敌人”中，很多只是房产主。他们拥有自己的住房，或者有少量的房子出租。红卫兵的命令发出后，人们到房管处排队上缴房产证，但是还是被抄家甚至被打死。在这种恐怖中，北京的50万间



私人房子全部被没收。

8月24号，红卫兵到北京东厂胡同6号居民左庆明家抄家。他从前开过劈柴铺子，1966年时已经没有铺子，但还有几间自己的房子。租住他们房子的马大娘是个家庭服务钟点工。当时左庆明正好外出不在家。看到红卫兵毒打他年已七十的妻子，马大娘到胡同口给左庆明报信叫他不要回家。红卫兵发现后把马大娘和左奶奶一起绑在葡萄架子上毒打。红卫兵还用开水浇烫她们。四周邻居听到他们在惨叫着被折磨死，然后尸体被丢进火葬场的卡车。那天晚上东厂胡同至少有六个居民被打死。死者中还有一人是技术精良的眼镜师孙琢良。他曾经开过一个眼镜店，并有自己的住房。

8月25日，北京第十五女子中学红卫兵查抄崇文区广渠门内大街121号居民李文波家。他住的是自己的房子。他已经在前一天上交了房产证，也就是说放弃所有权。红卫兵说，在抄家过程中李文波打了她们（文革后她们中有人私下承认并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但当时成为红卫兵加强暴力程度的借口）。李文波被打死。他的妻子刘文秀被判处死刑，在9月13日被处决。文革后他们得到“平反”。

8月28日，红卫兵查抄西城区大红罗厂南巷20号。三小时中红卫兵打死了五口人：北京玻璃陶瓷水泥设计院技术员黄瑞五，他的姐姐黄瑞班，他们的母亲陈玉润，外婆李秀蓉，还有一个年老佣人。除了一岁的小孩子被机警的保姆抱出，其他在家的人都被打死。他们没有别的所谓“问题”，主要的“问题”就是他们住的小院是他们自己的房产。

1966年8月下旬，大批被打死的人不标姓名堆在一起被运往火葬场。北京师范大学附属第二中学的校长高云和北京第31中的书记杜光，都是在被红卫兵打昏过去以后就送去了火葬场。火葬场的老工人发现他们还没有死，没有烧他们。他们又回了家。当时大量尸体积压，火葬场来不及焚烧，只好在尸体堆上放了冰块，血水横流。一名军人目击者说，那里的气味和情景恐怖至极。一名在9月13日去火葬场的女教师说，那时候那里还是满目尸体，草地上摆得横七竖八，排队火葬。

下图是那一个时期北京每日被红卫兵打死的人的数字。（图略）

从上图可以看到：李文波被打死后第二天，8月26日，被打死人数从两位数跳到了三位数，从不到一百人变为超过一百人。从8月25日到8月26日，被打死人数增加了百分之五十。从8月26日到8月27日，被打死人数又再次加倍。在9月1日，被打死人数达到了最高峰，一天内有228人被打死。在此之前的8月31日被打死人数出现了一个小低谷，是因为那一天在天安门广场有红卫兵的第二次盛大集会，红卫兵停下抄家打人集会去了。

9月1日以后数字骤降，因为9月2日中共北京市委发出文件，指出“要用最大努力耐心说服和坚决制止一切打死人的现象”。一个口气并不严厉的书面指示，就立即发生了效果。

当时“内部”的统计是，在北京，红卫兵打死了1,772人。文革后，《北京日报》也发表过这个数字。

在这样的暴力迫害高潮中，8月29日，“西城区红卫兵纠察队”发布了“第四号通令”，其中第7条说：“确实查明，并斗争过的黑六类分子，尤其是逃亡地富分子。除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处置外，其余一律给政治上、生活上的出路，这个出路就是限期（于九月十日前）离开北京（如有特殊情况，经本人所在单位及查抄单位批准，可酌情延长），回原籍劳动，由革命群众监督改造，给他们重新做人的机会。”

这个“通令”在北京全城甚至全国张贴公布。直接后果是北京城中有近十万人口被扫地出门驱逐出北京，占当时城市人口的百分之一点六。一名受访者说，她家住在东单，夫妇都是工人，因为曾经在一个出租小人书的店里有400块钱资本，这时候被指控为“资本家”，全家被驱逐到山东农村，一个人只准带一个锅一个碗，直到1978年底才获准回到北京。这些被驱逐的人有的在火车上就被打死，有的到了农村没有食物没有住房而死亡。

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这样大规模的由青少年打杀教师和老百姓的事情。在皇帝时代，死刑要经过审理，可以上诉，由专业刽子手执行。文革后有人把文革笼统解释为“封建主义传统”造成的。这种说法不能解释1966年8月发生的红卫兵暴力。

□ 原载《炎黄春秋》2010年第10期

~~~~~  
【学术争鸣】

毛泽东的文革与人民的文革——大众为什么不愿意全面否定文革

· 郝 忱 ·

毛泽东晚年说过：我一生做过两件大事，一是把蒋介石赶到那个海岛上了；二是搞了文化大革命。1976年9月，毛泽东去世；10月，“文革旗手”江青被捕，文革黯然收场。1981年，由邓小平主导，中共在继续高度尊崇毛泽东，仍把他供奉在神龛的同时，作出了“彻底否定”文革的决议。人们诘问：一个人一生做过的二件大事之一被彻底否定了，那么，他还那样伟大吗？文革是“十年动乱”，那么，1949年——2009年的60年还是“辉煌的60年”吗？另一方面，党内党外有许多人反对“彻底否定”文革，特别是在基层，三十多年里，不时有人发出“再来一次文革”的呼声，以至于“否定派”不得不说“要坚决守住这个底线”。许多人对询问“文革能不能彻底否定”的回答，几乎一边倒：“不能！”大众为什么不愿意全面否定文革，这是一个需要正视并理性地耐心地解释的问题，不能以“毛派煽动、愚氓之见”而一斥了之。听说有人（杨小凯）认为，文革有“毛泽东的文革”与“人民的文革”之分。虽然未闻其详，却颇给人以启示。

“毛泽东的文革”事实俱在，我们不乏记忆：《五·一六通知》、批判《海瑞罢官》、“毛主席天安门检阅红卫兵”、停课闹革命、“大串联”、破“四旧”立“四新”、“砸烂封资修黑货”、“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抄家”，毒打、迫害“地富反坏右资分子”及家庭成员）、揪斗“走资派”、打倒刘邓陶、批十七年文艺黑线、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反动学术权威、“一月风暴”夺权、“二月逆流”、“忠字舞”、“语录歌”、“一打三反”、武斗“内战”、“三支两军”、“清理阶级队伍”、城市居民迁居农村、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成立革命委员会、召开“九大”、林彪出逃、工农兵上大学、“抓革命，促生产”、“天大旱人大干”、“割资本主义尾巴”、高征购、普遍贫穷、批林批孔批宋江、评法批儒、批资产阶级法权、批右倾翻案风……“毛泽东的文革”是黑色的阴暗的凄惨的，应该彻底否定。

有没有一个“人民的文革”呢？依我看，“人民的文革”更多的只是在人们的想象中；现实的“人民文革”很少。称得上“人民文革”的，应是文革初期短暂时间内的群众斗官。少数官（“当权派”）由于个人品质不良，或体制的原因，或极左路线驱使（搞土改、合作化、统购统销、大跃进、办大食堂……），长期以来强迫命令、弄虚作假、欺压群众、耍特权，开始腐化堕落，伤害了一些群众，积存了民怨。运动一来，群众趁机揪斗出气。老百姓在权力面前，从来很弱势，平时忍气吞声。幸遇最高当权者允许群众斗“当权派”，自然是欢欣鼓舞。这是文革中

他们最感畅快的事，也是他们怀念文革、期盼再来一次文革的最大理由。“革命是人民的盛大节日”，如果不因人废言，那么列宁的这句话实在是讲出了民众在这样的日子里扬眉吐气、痛快淋漓的心态和神态。凭此，他们就“感谢毛主席”。

大众不愿意全面否定文革，是因为文革给了他们机会去斗无良官员；当局要彻底否定文革，也是因为“当权派”（官）们挨了斗。文革中如果只是“地富反坏右资分子”被斗，而“当权派”不被斗，那么当局会“彻底否定”文革吗？中共对土改、合作化、“工商业改造”、大跃进、反右派……无一彻底否定，唯独彻底否定文革，盖因为其它都是针对他人——地主、资本家、知识分子、工人、农民，只有文革是针对自己人。大小“当权派”邓小平们挨了斗，于是才彻底否定文革。形成鲜明对照的是：1957年反右运动，党组织动员人们提意见，然后把提意见的人划作政治上的右派，进行了二十二年之久的迫害。对如此颠倒黑白的政治运动，当局却至今只承认“扩大化”而不愿意“彻底否定”。

平心而论，文革初期斗官，只有极少数该斗，而且其恶行比之今天官员之恶（腐败）差得太远。大多数是误斗，不该斗。当时有出于私怨的报复性斗官，有出于派性之争的斗官，有“打倒一大片”形势下“凡官必斗”的斗，有对抵制极左路线的好干部的颠倒是非的斗，有把被毛泽东错误罢黜的领导干部如彭德怀、习仲勋重新拉出来批斗……误斗了许多好官、好人。

我不知道杨小凯所讲的“人民的文革”的具体内容。我读了一些资料，了解到这样的事实，似乎可以视为“人民的文革”：1967年，江西萍乡的中学红卫兵调查了解了当地一些“右派”的冤情，支持他们平反的要求。第二年，萍乡报社“政治迫害调查团”发布公告，为几位“右派”平反。湖南造反派的报纸《万山红遍》刊登了“右派”肖琦的文章“怒揭1957年反右斗争中的黑幕”，印发了2.7万份，两个月内收到两千多份来信。还有，文革初期，已经有一些城市青年单个或组织团体，批评中国党国政治体制的弊端，探讨如何进行政治改革，使中国社会走向自由民主法治。这些“红卫兵”、有志青年利用当时容许“四大”的自由宽松环境，顺应“革命”大势，进行了与毛泽东的主流文革内容不同但很正面的真正可称之为革命的行为（与“十里长街送总理”、“四五”天安门运动以及张志新等人的反文革行为也不完全相同）。相信，今后随着对文革研究的深入和扩展，会有更多类似的事实展现于世，丰富“人民的文革”的内容，确立“人民的文革”的命题。

许多人不愿意全面否定文革，还因为他们相信并且至今认为毛泽东进行文革是为了人民的利益，文革是他们心目中的“人民的文革”。毛和当局宣传说，文革是为了“反修防修，清除党内的走资派，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确保无产阶级江山永不变质，避免劳动人民回到旧社会，再吃二遍苦，再受二茬罪。”大众相信了这样的宣传，拥护这样的文革。之所以相信，是因为：

- 1、毛和中共一贯精于宣传。

- 2、党国体制封闭，处处设密，民众难以知道详情真情，尤其对高层内幕更不知晓。

- 3、毛要打倒的刘少奇有一些不当言行，如他说，资本家“剥削有功”、“剥削的越多越光荣，功劳越大”。文革初期，毛躲在外地，刘沿用过去的方法，向高校派出工作组整群众，后来被毛泽东“我的一张大字报”批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压制群众，何其毒也”。还有，刘的夫人王光美搞“四清”运动，炮制“桃园经验”，整了许多干部群众，招致民众愤恨和批判。在这个除了毛，人人没有自由表达权的体制内，刘少奇无法辩解，于是，人们相信了他是“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是“中国的赫鲁晓夫”、人民的敌人。本来，中共建政以来，刘少奇主张“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正确路线，毛泽东瞎折腾，是一系列灾难的罪魁祸首，正应成为被革命被打倒的对象，但由于以上原因和毛泽东掌握大局和话语权，人民相信了毛而拥毛反刘。当时“造

反”组织喊着毛的口号：“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相互指责是保皇（刘）派，其实刘被毛任意宰割，哪里算得上是“皇”？毛才是“皇”，该拉下马。

文革中的最大悲剧是，人民相信了不该相信的，批了不该批的，保了不该保的，斗了不该斗的（也有该斗的）；文革的最大错误是“横扫一切”，“砸烂一切”，没能把运动局限于“斗坏官”，并进行到底（毛规定，运动的重点是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不是打倒腐败官员），所以必然达不到人民原先相信和追求的目的。

4、毛泽东作“亲民秀”，有一些颇能打动民心的言行，如批城市老爷卫生部、培养赤脚医生、批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戏、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文艺下乡、工农兵上大学、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工人阶级领导一切、批资产阶级法权、批剥削有功论、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何其毒也”，宣传“工人农民起来造剥削压迫他们的地主资本家的反，造反动派的反有理”、宣传“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等等，把自己装扮成了下层民众的代表，给文革添上“无产阶级的阶级性”和道德性，赢取民心。

5、每一个政权建立后都确实存在一个如何防止腐烂溃败的问题（用毛的语言表述，就是需要“继续革命”）。现代民主宪政国家以民主和法治来防止政权蜕变，古代专制王朝以皇权支持的内部监察弹劾制度来防止官员贪弊腐化和政权垮台。中共建政后沿用了古代王朝内部监督这一套。在政权刚建立伴随的新气象大形势下，加上毛泽东“阶级斗争”的冷峻氛围和治吏严苛，当时的官员和政权表现了相当程度的廉洁性，但腐败现象已经出现。毛泽东说，一些干部进城后脱离了群众，高高在上，滋长了骄气和娇气，耍特权，群众有气。过去我们想了很多办法没能解决，现在找到了办法，就是放手发动群众，让群众起来揭发批判他们，让群众出气……（大意）。这一番言论入情入理，既加强了民众对毛发动文革的动机是为了反腐防变，为了人民利益的认同感，也赋予他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以合理性。甚至可以认为，以这样大民主的方式解决官员和政权的蜕变问题，是他在延安窑洞与黄炎培所说“让群众监督政府”思想的一种试验性实践。当然，事实证明，防止官员和政权的蜕化变质，应该依靠现代民主政治制度；以文革这种“大民主”的运动方式解决不了问题，反而造成动乱、误伤好人、被阴谋家利用等不良后果。文革结束以后，中共丢弃了这种“大民主”方式，取消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称之为拨乱反正；但他们既拒绝实行现代民主国家行之有效的权力制衡制度，又变本加厉地禁止人民行使集会、游行、罢工、言论、新闻、出版等自由权利，不“让群众监督政府”；依然沿用过去无效的自我监督的一套，结果愈加腐败，至今已是腐烂透顶，不可收拾。

中共1949年建政至1966年文革时的一系列错误（大跃进、大饥荒等），以及当时政权和官员已经出现的腐败现象，激发中国民众踊跃地投入到文革初期的“斗官”运动中去；今天中共政权和官员们心惊肉跳的腐败，使中国老百姓惋惜文革没有把斗官运动进行到底，惋惜“毛泽东最大的错误是没有杀掉某某人”；更使他们认为不应该全面否定文革，甚至呐喊：“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

可见，大众不愿全面否定文革的主观原因是，相信了毛泽东及当局对文革目的的美化性宣传；客观原因是政权变质、官员腐败的现实和文革初期短暂的斗官经历。这样的现实在文革之后三十多年内愈加严重，强化了民众的认知，促使“再来一次文革”的呼声越来越强烈，情绪越来越激愤（常听到“再搞一次文革就不只是给他们戴纸帽子游街，而是十个官就有九个被杀死”之类的血腥语言）。

以上议论当然不是赞成文革正确、应该再搞一次；只是说明，十年文革是一个复杂的现象，大众不同意全面否定文革有原因、有道理。面对老百姓反对全面否定文革，呼唤再来一次文革

的汹汹民情，空喊“坚决守住（彻底否定文革）这个底线”，毫无作用。一个结论、一种认识，如果需要像守卫阵地一样地“防守”，那么一定是这个结论有毛病，不能服人（就像中共文宣部门把舆论——民意民情称为具有军事色彩的“阵地”，高喊舆论阵地“守土有责”一样。这个“守”，说白了就是对抗民意，长远看，一定守不住）。当前应做的，是当局必须努力消除造成老百姓要求再搞“文革”的原因。否则，矛盾积累，危机加剧，不定那一天，就会发生革命（“文化”的革命——集会游行示威，甚至“武化”的革命，暴力）。

有些人很担忧“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这真是杞人忧天。中国决不会再发生1966——1976年那样的文化大革命。那次文革是最高当权者毛泽东自己发动的，现在当局有谁具有发动文革的丝毫可能性？他们一心“维稳”、坚决维护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一万年不动摇、永保自己在内的权贵利益集团的幸福日子万古常青……，怎么可能“发动群众”让民众揪斗“当权派”呢？知识先生们失去了常识，无由头地担忧。在害怕革命、反对革命问题上与当局惊人地一致。

所谓“再来一次文革”，要搞清再来一次什么样的文革、谁的文革。“毛泽东的文革”，当局不会搞，人民也不会要——那是一个运动不断、普遍贫穷、人民不幸、官员也不美气（开初短时期内“官不聊生”，后边长时期内民不聊生）的文革。人民不要这样的文革，所谓“毛派”们能搞得起来吗？而且，有什么证据说“毛派”们鼓动的“再来一次文革”，就是当年的那个“毛泽东的文革”，就是要完全回到毛泽东时代？搞那样的文革，人民会跟着他们跑吗？回到毛时代，可能吗，人民答应吗，毛派自己受得了吗？我们应该想想这些问题，不要作无谓的担忧和争论。依我看，人民喊“再来一次文革”，无非是在当局无心和无力治理腐败的情况下，要求由民众自己起来反腐败、斗坏官而已（决不是又要“砸烂一切”、“横扫一切”，揪斗、迫害“地富反坏右资”等）。对这样的“人民的文革”，凡人民的朋友，没有必要担忧、惧怕和反对。我就不，因为我知道，如果发生了斗官的“文革”，那么，我们担忧没用，人民毫无责任。那叫“官逼民反”！

最后，谈谈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问题。毛只是为了搞掉刘少奇及其势力而发动文革的吗？对此，我无力肯定，也无力否定，只想提出一些疑问和事例。1959年庐山会议上，鉴于之前大跃进的大失败，中共高层几乎一致认为应该纠左。然而当毛泽东因彭德怀谏言而“龙颜大怒”时，全体马上一致转向，随毛批彭，把他和张闻天、黄克诚等打成反党集团。1966年毛发动文革后不久，刘少奇一明白是冲自己而来，就立即缴械投降，提出回延安或湖南老家种地。1969年中共“九大”之后，毛又想搞掉刚刚当选的党的唯一的副主席、写进党章的接班人林彪，也不过是搞搞“批陈整风”、“南行讲话”，向下边吹吹风、打打招呼，就迫使林彪“仓惶出逃”，葬身异国。说明：在中共这样高度集权的体制内，以毛泽东从“延安整风”以来就形成的绝对权威，以中共高层诸公明哲保身、随风倒浪、墙倒众人推的德性和中国古来“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政治文化传统，为君者毛泽东要搞掉刘少奇及其势力似乎不需要发动文革这样的全国性大运动就能做到。正如毛泽东于1964年底当面对刘少奇说的，我动动小指头就能扳倒你。再看之前、之后的斯大林和邓小平。斯大林清除“二把手”托洛斯基及其他党内巨头布哈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都没有搞运动，用党的会议就搞定。1986年，邓小平指使几个老人开了一个“民主生活会”，就迫使党的总书记胡耀邦辞职；1989年，邓又在党中央会议未履行任何手续的情况下，就把另一位总书记赵紫阳搁在一边，以后给赵扣上“分裂党”的罪名解除其职务并长期软禁。甚至在邓死后，其阴魂还附体于俩届继任者，一直把赵紫阳软禁至死。“共产国家”极权主义体制内最高统治者的权威之威之烈，由此可见。由此，也促使我们发问：毛泽东发动文革只是为了打倒刘少奇吗？他的真正动机或全部动机是什么，或，他另有动机吗，“理想主义说”成立吗，以毛的人品人性（“马克思加秦始皇”），他会有什么样的理想呢……，令人费思费解！

□ 节选自《思潮与异见》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华新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 0 2 1－8 6 0 2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